



阅读人

2014年6月25日
星期三
第20期
(总第38期)

贵州民族大学图书馆 主办

秋韵文学社 协办

图书馆主页:<http://lib.gzmu.edu.cn>

主编:卢云辉

责任编辑:吴东京

版面设计:吴东京

电子信箱:yuedubaokan@126.com

内部交流,免费赠阅

走过遗址:考古所见的贵州历史



过往的一切,皆成历史;一切均是历史的产物。

然而,并非过往的一切均能留下印痕供今人凭吊,能保存至今的先人足迹毕竟少之又少,那时的一份寻常,如今成为窥知那个时代无比珍贵的遗产。而探知秘密的方式只有一途,那便是考古学。

考古学是一门通过寻找真凭实据的方式,使人类已然模糊的往事逐渐清晰的学问。考古学家所从事的仿佛是盲人摸象般的探索,在摸索中缀合象的肢体,以窥知其全体。在缀合的过程中,那些刻满文字的甲骨,划着水纹云纹的彩陶罐逐渐完整清晰;人类从洞穴走向阶地,从茹毛饮血的石器时代走向铸造青铜的铜器时代,走向用铁制造工具的铁器时代,那些逝去的、行走的轨迹一一凸现。

考古所见的贵州历史,超越 600 年,达数十万年之久。

黔山宜人古已然。贵州多洞穴的喀斯特地貌使其成为穴居时代人们的首选之地,考古发现的这一时期遗存尤多,有 300 处左右,盘县大洞、兴义猫猫洞、普定穿洞、安龙观音洞等遗址名称如雷贯耳,著名考古学家裴文中先生用“名列前茅”来形容贵州旧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距今一万年左右,人类开始使用粘土烧造的陶器,使用磨光石斧和石刀,步入新石器时代。人们走出洞穴,开始在水草丰美的河边阶地营造家园。

战国秦汉时代,是中国青铜时代结束,铁器时代开始的时期。战国秦汉时代的贵州,是土著文化高度发达,汉文化开始流行的时代。考古发现的贵州这一时期遗存异常丰富。汉文化的大规模涌入,引发了一场夷汉之间文化的长期拉锯,此消彼长,两汉之际汉文化曾一度占据上风,而土著文化终成贵州文化的主流,是今日贵州多彩文化的根基所在。

夜郎是战国秦汉时代中国西南一小国,西南诸邑中,史称“夜郎最大”,武帝时夜郎王曾与滇王一同授印被封。西汉成帝和平年间(前 28~前 25 年),夜郎王兴被诛,夜郎灭亡。从战国晚期至西汉晚期,其在历史上大约存在了 300 年时间。关于其地望,一般认为在贵州西部。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贵州西部的盘县、威宁中水、辅处、赫章可乐、普安铜鼓山、安龙、兴义、兴仁、册亨、望谟、晴隆、六枝、织金等地就不断有战国秦汉时期的青铜遗物发现,多数学者认为其即夜郎之遗存。其中,威宁中水、赫章可乐和普安铜鼓山三地发现最丰,它们是贵州土著文化发展到高峰的标志性遗存。

西汉中期开始,武帝开发西南夷,在夜郎故地上先后设置犍为郡(前 135 年)、牂牁郡(前 111 年),推行郡县制和分封制并行的羁縻之制,大量的汉族官吏、军伍、商贾、豪民进入夜郎地区,贵州本土文化被迅速汉化。贵州这一时期的考古资料十分丰富,相关论述也较多。汉文化的涌入,表现在考古学文化上,就是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各种器物逐渐减少,而汉式器物逐渐增多。这种趋同性,已为以往的研究者所强调,如贵州“西汉后期的墓葬中,汉文化器物占据了主导地位,并出现了两种文化融合的器物”;东汉时期墓葬所出随葬品,“已与中原地区同期汉墓所出者无殊”。

魏晋以降,随汉文化控制力的减弱,土著文化开始全面回流。这一时期遗存贵州发现不多,但类型多样,内涵丰富,仅墓葬便有砖(石)室墓、崖墓、石板墓、瓮棺葬、悬棺葬等多种不同类型。多数遗址和墓葬中均发现了手镯、指环、铜铃、扣饰、发钗、条脱、串饰等装饰品,且其在墓葬随葬品中所占比例较大,这是其明显不同于两汉时期遗存之处。类型的多样化、装饰品的大量出现是这一时期汉文化阵营的萎缩和土著文化回归的直接表现。贵州土著文化的影响一直持续至今,以唐代之盛,其在贵州却鲜有历史遗迹。

考古材料揭示,战国秦汉至魏晋之际的贵州文化经历了土著——汉化——土著的演进历程。以西汉中期为界,此前以夜郎及其文化为代表的土著文化占据主流;此后随武帝开发西南夷,在贵州推行郡县制,汉文化沿着既有的孔道和土著聚居区,迅速由已成为汉文化阵营的川渝地区由北而南向黔中渗透。至东汉时,表现在考古学文化上,贵州这一时期的遗存已与全国其他地方的无太大区别。魏晋以降,由于战乱,汉文化阵营在贵州逐渐萎缩,土著文化开始回流,以唐代之盛,却几乎未在贵州留下遗迹。

魏晋以降土著文化的回流,在宋明时代的贵州结出硕果。这块土地上先出现了自杞、罗殿等小国,又出现了水西安氏、水东宋氏、播州杨氏、思州和思南田氏等几大土司,他们都留下了丰富的物质遗存,成为探索羁縻·土司制度弥足珍贵的实物证据。近年引发关注的遵义海龙囤遗址,即是播州杨氏最著名的遗存之一,因为与明代一场重要的战争有关,《明史》12 次提到了该囤。

1413 年建省后,贵州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格局都发生了改变,国家在边地的统治得到强化,国家化的步伐加快,再一次的汉化浪潮滚滚袭来。据明清文献的记载,时人开始“渐慕华风”,乐于接受汉文化之化。

夷汉文化的对峙、拉锯、交融是贵州文化的主旋律。这些都铭刻在有幸保存至今的遗址里。走过遗址,看到迷人的历史深景。那些沉睡在幽暗岩洞里上千的祖先,他们的名字在鬼斧神工的念诵中被一一提及,他们的一生幻化成一个符号,如流星划过,一闪即逝。他们的灵魂却在念诵中复活,骑着绘在棺上驮魂的马儿在空气中飘荡,把置身在墓葬中的你,紧紧包裹。那些岩石上红色的影子,是巫师指尖跃动的精灵。没有音乐,没有喝彩,他们在这石崖上默默舞蹈。那是一群在篝火旁舞蹈的先民,由于一次祭祀,由于一次狩猎的满载而归,或者征战的凯旋,他们在篝火旁欢快地舞蹈。红色的火焰闪耀着,投在石崖的影子随火焰扭曲、跃动。最后,在篝火燃尽的一刻,红色的影子就永远定格在神秘的石崖。那水族墓碑上铭刻的图景啊,关乎爱和信仰。300 年前,我愿是这苗岭深处一名笨拙的石工,把爱与信仰虔诚地铭刻在墓碑之上。碎屑飞溅之中,那时的生活和神仙世界人物圆润的面庞在我长满老茧的手中一一凸现。300 年后一个冬雨绵绵的季节,你循小径而来,你的手指滑过每一块碑刻,解读隐藏的秘密,我们开始默默对话。

“风沙来前我为你/曾经那样深深埋下的线索/风沙过后为什么/总会有些重要的细节被你遗漏”。数千年后,考古者循着芙蓉千朵芳香的河,走过遗址,去寻找那些被风沙深埋而遗漏的童年细节,去缀合那些被时间的河击碎的文明碎片,渐渐走近人类业已模糊的童年。

走过遗址,在已死的废墟里,看到变幻的世界。走过遗址,在先人驻足的地方,看到令人骄傲的美丽风景。

资料来源:节选自走过遗址:考古所见的贵州历史·贵州都市报数字报。(2013-08-13)[2014-06-19]http://dsb.gzdsw.com/html/2013-08/13/content_214769.htm

考古学基本知识

【考古学】

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在各种活动中遗留下来的实物史料,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的一门学科。实物史料包括传世文物和考古发掘工作中获得的遗迹、遗物。考古工作者据以研究古代政治经济状况和物质文化面貌,阐明社会发展的规律。

【考古学文化】

用以表示考古遗迹中(特别是原始社会遗迹中)属于同一时期的有地方性特征的共同体。同一文化的遗存,有着同样形式的工具、用具和相同的制作技术等。

考古学文化的名称,大多以第一次发现的典型遗址的小地点命名,如“河姆渡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等等。也有以该文化中的某一具体特征性的遗物来命名的,如“细石器文化”、“印纹陶文化”等等。后一种命名容易以片面的特征代替整个文化的特征,同时,这种个别类型的特征遗物,还可能分属于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因而近年来这种命名方法已逐渐为人们所淘汰。

【文化层】

指由于古代人类活动而留下来的痕迹、遗物和有机物所形成的堆积层。每一层代表一定的时期。考古工作很重要且具科学意义的一项内容,即是从地层上正确地区划出上下文化层的叠压关系,根据文化层的包含物和叠压关系,可以确定遗址各层的文化内涵和相对年代。从各层中取样测定的孢粉资料,可以了解当时各个阶段的植被和自然环境。

【遗迹】

指古代的人们进行各种活动后遗留下来的痕迹。包括遗址、墓葬、灰坑、岩画、窖藏及游牧民族所遗留下的活动痕迹等。其中遗址又可细分为城堡、废墟、宫殿、村址、居址、作坊址、寺庙址等,还包括山地矿穴、采石坑、窖穴、仓库、水井、窑址、壕沟、栅栏、围墙、界壕等等。由于地域、时代及民族的不同,遗迹面貌也各不一样。就新石器时代居址而言,各地居室的形式与营建方式各不相同,山区有洞穴居址,沿海有贝丘遗址,沼泽有干栏式建筑,平原地带、黄河、长江流域大部分地区盛行粘土木构建筑的居室或半地穴居址等。其他如城堡建筑、古代墓葬,帝皇陵墓的各种埋葬坑、人殉坑、兽殉坑、车马坑等,也都显示着地区、时代及民族的各自的独特风俗、风格。

【遗物】

即古代人类遗留下来的各种生产工具、武器、日用器具及装饰品等,也包括墓葬的随葬品和墓中的画像石、画像砖及石刻、封泥、墓志、买地券、甲骨、石经、纺织品、钱币、度量衡器等。一般而言,遗物都经过人类有意识的加工和使用。其中未经人类加工的自然物则必须与人类活动有关而能够反映人类活动,如各种作物、家畜及渔猎或采集获得的动植物的遗存等。遗物按材质分石、陶、骨角、玉、金属等,按用途分生产工具、生活用品、随葬明器等。

【旧石器时代】

是考古学上石器时代的早期阶段。前后约二三百万年,结束于大约一万年前。当时人类使用比较粗糙的打制石器,过着采集和渔猎的生活,相当于人类历史上从原始群到母系氏族公社出现的前期阶段。我国已发现的旧石器时代人类化石,重要的有元谋猿人、蓝田猿人、北京猿人、马坝人、长阳人、丁村人、柳江人、山顶洞人等。有的人类化石与文化遗物同出。

【新石器时代】

考古学分期中石器时代的最后一阶段,开始于约八九千年以前。磨制石器及陶器的发展,是这一时代开始的标志。纺织、畜牧和农业,使人类的生活资料有了比较可靠的来源,开始定居生活。目前我国发现较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年代为公元前 6000 年,结束年代为公元前 2000 年左右。我国各地普遍发现不同类型的新石器时代文化。

资料来源:节选自考古学基本知识·博宝艺术网。(2008-03-24)[2014-06-19]<http://news.artxun.com/shiqi-885-4423348.shtml>



贵州考古发掘震惊国内考古界 海龙囤揭开神秘面纱

刚刚过去的 2012 年,我省的一项考古发掘,因“以考古探寻中国土司制度意义重大”而入选 2012 年中国六大考古新发现。这项成果,就是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去年进行的为期 200 余天的遵义海龙囤考古发掘,它为海龙囤成功晋级“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这一年,贵州考古成果显著,引发各界前所未有的关注。自 5 月中旬起,几乎每周媒体均有关于贵州考古的新闻推出,并两上中央电视台。多项工作开创了贵州考古的第一次——

第一次用全站仪对考古现场进行全面测绘;

第一次航拍与航测;
第一次对考古现场进行三维激光扫描;
第一次开展大型公众考古活动;
第一次有国家局领导莅临考古工地指导;
第一次就某次考古发掘召开专家现场会,等等。

2012 年,对贵州考古而言,是不平凡的一年。

田野成果累累

海龙囤遗址

入选中国考古新发现

记者在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采访了解到:该所去年取得了显著的田野成果和工作业绩,全所共完成考古调查 41 项,其中配合基本建设考古调查 39 项,区域性考古调查 2 项。共发现文物点 289 处(座),其中古生物化石点 2 处、史前遗址 24 处,秦汉遗址 1 处、宋明遗址 4 处、宋明墓葬 244 座、地面文物遗存 12 处、汞矿开采遗存 2 处。

在考古发掘方面,2012 年共进行考古发掘 4 项,包括海龙囤考古发掘、赫章可乐廖家坪遗址和墓葬的发掘、务川镇南汉墓发掘、平坝牛坡洞遗址发掘。

完成海龙囤遗址和万山汞矿遗址考古调查勘探和清理工作。

海龙囤是遵义的一座古代军事城堡,始建于唐朝,扩建于南宋及

明朝,1600 年初夏毁于明朝“平播”的战火。

海龙囤遗址位于遵义西北 30 余公里处的太平乡龙岩山,又名龙岩囤。它居群山之巅,四面陡峭,左右环溪,面积 1.5 平方公里,植被完好,山川险峻,是当今中国乃至亚洲保存完好的中世纪城堡遗址。

11 年前,海龙囤正式成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2012 年 3 月,贵州省文物局正式启

动海龙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相关工作,4 月 23 日,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领衔的联合考古队在副所长李飞的带领下进驻海龙屯,展开田野考古工作。考古的介入,在人们揭开海龙屯神秘面纱的同时,也为申遗工作提供了具象支撑。



联合考古队在为期半年多的海龙囤考古发掘工作中取得重大突破:发现了环绕新王宫的城墙、厨房、厕所以及采石场、窑址等遗迹。其中的城墙,一共长 504 米,有一部分城墙在地面有遗留。发掘中,出土各类文物达 2000 多件,目前已经修复了 100 多件器物,还发掘出很多物件,有动物骨头做的秤杆、青铜做的象棋子、考究的砚台等。此次考古发掘初步厘清新王宫建筑群的整体格局,对全国遗存的分布与功能有了新的认识,为海龙囤成功进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奠定了坚实基础。

海龙囤的发掘,在贵州考古中首次采用了航拍与航测、重要遗迹的三维激光扫描、全站仪测绘等新的记录手段,极大提升了田野水准,发掘水平与发掘成果得到业界广泛认同,成功入围了由中国社科院每年组织评选的“2012 年度中国考古新发现”,入围这一新发现的成果在全国仅有 6 项;此外,这一发掘还入围文物出版社的“2012 年度全国重要考古发现”。

海龙囤的发掘还开启了与当地政府积极互动,与当地村民



有效沟通,以及发掘、保护与展示整体推进的新模式。针对当地贫困村民所开展的慈善活动,被国内媒体及专家高度赞扬,称其“走出文化扶贫新路”、“不仅做考古,还关注了民生”。

为提升海龙囤的知名度,有利于“申遗”工作的开展,发掘过程中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开展了有计划的宣传攻势,自 5 月中旬起,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中新社、《中国文物报》及我省多家媒体持续报道了此次发掘的新收获,相关报道被凤凰网、新浪网、新华网、中国考古网、中国民族宗教网等知名网站转载,使发掘的过程成为申遗的过程、研究的过程和宣传的过程。同时,发掘过程中先后四次开展“亲历考古,触摸四百年土司生活”等为主题的公众考古活动。

在 2012 年进行的其他 3 项考古发掘中,也有不少新发现。2012 年 7 月至 9 月,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赫章可乐廖家坪遗址和墓葬进行了发掘,遗址发掘面积 1000 平方米,清理出房屋、灰坑、灶、沟等遗迹,出土大量遗物,有石器、陶器、铜器、铁器等。此次发掘最为重要的是清理了两座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两墓共出土遗物 90 余件。其中的 M373 是目前为止可乐乙类墓中出土遗物最为丰富的一座,有陶器、铜器、铁器、骨器、漆器、串珠、海贝、玛瑙等。从此次清理的两座墓的形制和出土的遗物来看,极大地丰富了赫章可乐墓葬的文化内涵。使用椁的现象之前在可乐的乙类墓葬中尚未发现,而且此次清理的 M374 号墓,其规模与同时期的汉式墓相当,这在已发掘的乙类墓葬中为最大的一座。

10 月,省考古所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联合对平坝牛坡洞进行发掘。该遗址位于贵州省平坝县马场镇平寨村魁山组(又名龟山、坤山)东,由三个洞穴组成,此次发掘的是其中两洞。发现的文化遗物以小型打制石器最多,数量超过万件;其次是陶片;砾石工具数量比较少,少见大型打制石器。此外,在其中一洞前发现三座墓葬。根据地层判断,时代大致不晚于新石器时代晚期。

11 至 12 月,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又对镇南汉墓进行了发掘,发掘面积为 1000 平方米,发现灰坑 9 个,沟 3 条,房屋 3 座,柱洞 100 余个,灶 1 座,出土遗物有陶片、瓷片、钱币。还清理了两座墓葬,其中土坑墓 1 座,砖室墓 1 座,出土陶器 8 件。

专家高度评价海龙囤考古

海龙囤考古引起国内专家学者的高度重视,先后有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童明康、国家文物保护组专家陈雍、北京大学文博学院院长赵辉、北京大学孙华教授、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考古学博士陈畅及省内众多专家学者,先后登上海龙囤,踏勘现场,并提出宝贵意见。

2012 年 11 月 9 日至 11 日,20 多个考古“大腕”云集海龙囤,重点考察了此次发掘的“新王宫”遗址。在遗址发掘现场,对清理出的重要遗迹进行讨论,考古队初步认定的厨房、厕所、房屋建筑、交通系统、排水设施和内城墙等尤其引起专家们的关注。

徐光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副所长):海龙囤是贵州一次重大的考古发现。这个城保存得非常好,非常罕见,建筑也非常宏伟。它的价值,从历史价值到学术价值,都是很重要的。它代表着贵州乃至中国的一段历史,即土司制度的历史,所以具有非常高的历史价值。这段历史文献虽有记载但不是很清楚,从实物的角度来了解,就显得十分重要。

李伯谦(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原院长):参加了海龙囤发掘现场,让我感到震惊和振奋。震惊的是我们对中国古代不同历史时期的古迹了解还是很少,以土司制度留下的遗迹来看,我觉得海龙囤特别珍贵,对它的发掘牵涉到对中国土司制度的认识和评价问题,土司制度从最开始的起源到改土归流时废止,少则 500 余年,它的存在是历史的选择,这对我们很多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管理,有借鉴作用。

振奋的是这次考古工作做得相当好,做得非常细致。他们一边发掘,一边查很多文献来认识这段历史。这就与单纯的发掘很不一样,因为查了很多文献,你就会知道你挖的是什么,重点是什么,包括对局部的解释等等。这是我们以后做考古工作都应该好好学习的,发掘过程中,要随时思考问题。

安家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看了遗址之后很震撼,这种军事要塞做得这么复杂,层层设防,国内这个时期的东西,很难见到这么好的。与湖北、湖南土司遗址比较,海龙囤的山城特点更明显。

白云翔(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这是一次高水平的发掘,将会为土司制度和土司文化研究提供很多物质方面的证据。

王仁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遗址本体非常壮观,而且保存得比较好。它的一砖一石都应该是研究地方史、研究中国史的重要资料。希望海龙囤的考古力争做成一个民族考古的典范,它对于认识周边民族,对认识中央王朝与地方的关系等,既有历史意义,也有现实意义。

宋建忠(山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很钦佩贵州省考古所,在短短的二百多天,就有这么大的发现,也很钦佩李飞的团队,在整个工作中摸索了一套完整的体系,从规划到这个过程,再到综合学科的应用、高科技手段的展示,都做得非常好。

王红光(贵州省文物局局长):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海龙囤一直被定义为古建筑,而不是大遗址,随着海龙囤考古工作的开展,大家对海龙囤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海龙囤作为大遗址的性质更为明显。海龙囤已经入选《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本次申报联合湖南老司城、湖北恩施土司遗址等三处土司遗址作为南方土司遗址集体申报。无论从年代、规模、保存完整性、多样性以及对周边区域的影响来说,海龙囤作为中国南方土司遗址的代表不言而喻,而作为四处入选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的项目之一,海龙囤最有望率先冲刺世界文化遗产。



资料来源:贵州考古发掘震惊国内考古界-海龙囤揭开神秘面纱,贵阳新闻网(2013-01-19)[2014-06-17].http://epaper.gywb.cn/gyrb/html/2013-01/19/content_328255.htm

格至诚正修齐治 情满青山气满肠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叶成勇博士专访
本报记者：江靖雯

在采访之前，听闻叶老师是一个特别优秀的、具有奉献精神的人，听说学考古的他具有强烈的责任感，经常自费带学生走村串寨，不计劳苦、不求回报，孜孜不倦地搜寻有价值的历史资料和文献，足迹踏遍了贵州的山山水水。采访过后觉得果真名不虚传。来到叶老师的办公室，感受到他的人生智慧与处世态度。和蔼的笑容，耐心的解答，让这次采访变得生动有趣并大有收获。



关于叶老师在求学方面的事，他给我们说了很多，并分享了他自己的学习方法。在求学过程中有很多人给了叶老师帮助，正是这些学习方法与帮助，才成就了今天的叶老师。

记者：能给我们说说您的学习经历吗？

叶老师：我 1997 年考入贵州民族学院历史系，当时感到很满足了。在班上我的基础很差，差距很大，有压力，所以就开始定计划努力学习。制定自己的作息计划、坚持早锻炼、写日记，这三件事对我的影响很大，培养了我的意志力，使身心得到协调发展，靠自己摸索出了成长的道路。在这期间我看书涉猎面很广并坚持做笔记，正是因为这个学习习惯为我的古文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我考研时帮了我很大的忙。我感觉一个人看的书越宽广，总有发挥它价值的时候，看书是一件终身的事。

记者：侯绍庄老师是您的恩师，能不能谈谈您与侯老师的情谊。

叶老师：我算是侯老师的关门弟子，记得他给我们上了两个月《史学概论》，侯老师讲课很有特点，他上课一般不用讲稿，只靠一支粉笔，知识便脱口而出，他的记忆力很好。我毕业论文选题找到侯老师，他给了我很多的指导。考上研究生后去拜访侯老师，当他得知我要去外地考察时，介绍了很多自己的朋友，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在 05 年后，我每年都会去拜访他，和他聊聊天，请他讲讲课。

记者：您是中央民族大学的博士，能谈谈您在北京求学期间或在我校学习和工作期间对您本人影响最大的人或事情有哪些吗？

叶老师：北京的求学，第一便是遇到我的恩师杨楠老师，三年里在我的生活学习上他给了我很大的帮助；第二是在北大课堂上学到了很多的东西；第三是交到了知心的好朋友，他们与我相互鼓励，帮我渡过难关；第四则是在国家图书馆畅游书海，使我提升了自己；第五是在撰写论文时家乡朋友给了我很大的帮助。这些事和人对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叶老师博士毕业后又回贵州母校任教，在这期间他不断地尝试、创新，以不同的方式来进行教学。在他身上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为了教学而教学，而是一个带着民族传承责任感的人在坚持做一件十分辛苦的事，这不得不令我们心生佩服。在阅读书籍中，叶老师也有着他独特的见解。

记者：能谈谈您选择回母校任教的原因以及当时的想法吗？

叶老师：当时我是研究生报了定向，所以毕业后顺理成章地回来了，因为我觉得贵州还需要人来做考古学。但回来之后有很大的失落感，带着想法，却实现不了。后来自己摸索着走，现在渐渐找到了路。组织成立了“民族文化保护协会”，因为我觉得民族的东西，是需要保护的东​​西，更需要人来做。2012 年创立了“国学社”，两个社团并不冲突，因为不能回到贵州就只讲贵州，历史学讲的是一个大历史观，我们需要全球化视野下的历史和文化，而不能只局限于贵州少数民族。两者相得益彰，相互促进。

记者：据说几年来您定期不定期带领历史学本科生到花溪周边的乡镇进行田野调查，您能谈谈您带学生调查有哪些体验与收获吗，对学生成长、科研学习有多大的影响和帮助？震惊地听到这些调查都是您自费的，您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叶老师：这样的调查对于学生肯定有很大的影响。我从 07 年开始探索，每年只要有时间都会进行调查，在方法与程序上也

变得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完善。我们的调查大多是家谱、碑刻、民居、遗址等，性质是普查性的，工程量较大，需要有科学的方法和认真严谨的态度。有时候碰到一块田野中的碑刻，非常兴奋，但要识别记录却很艰难，需要文字学、地方史、民族学等知识，光抄录就要三四个小时，有的风化很严重，字不好辨认，有时看得眼睛都花了，但是乐在其中，因为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什么都忘记了，变成了一种享受，阳光再强烈，却感觉不到它的存在，感觉很充实。这是一种深度的体会，文化的魅力和特有的情感交织在了一起。

不求名利，自掏腰包，因为这就是一种责任，我经常给同学们讲，我们不做谁来做？没有为什么，我学了这个专业，我不来做，谁来做？就像医生一样，他不来救病人，谁来救病人？就是这样简单。因为你学了这个专业你可以体会到它的价值、它让人悲喜的地方，所以你担心这些东西会丢掉，担心以后的学生能对历史文化理解多少。我这样做肯定是值得的，民族和国家的发展，没有文化的传承是不行的。我们做的不是宏大的工程，而是点点滴滴的事情，年轻的学生现在接触的这些，会刻骨铭心一辈子，当以后回望大学时，可能最深刻的记忆便是去调查的这些事，因为太真实，会有很多感触。这不仅仅是一个专业的教育，更是一种对民族对历史的一种情感培育在里面。历史会让人有很多共鸣，因为真实，可以感受到最深刻的东西。但要带着理性的批判与深厚的历史情怀去看，这样的调查是教学相长的事。带学生到相应的场景，他不得不去反思历史的问题。去面对、去思考的这个过程非常有益。民族传统专业人才的培养必须改革，要让学生去参与学习、体验历史、感知文化的魅力；要有历史的情怀与批判精神，有了这些可以找到幸福感，只有明白了才会释然；只有在体验参与中才可以去感知，才可以把课堂的东西转变为对人生的感知。

记者：您能给我们推荐几本提高历史兴趣或是推荐适合广大学生普及历史或考古知识的书籍吗？

叶老师：可以读《大学》、《中庸》。它们包含了中国人最基本的人生价值观在里面，是终身要读的书，能背下来是最好的。我以前在偶然之中接触到了它们，然后读上了，爱上了，思考了，到现在离不开它们了。我每年都在读“四书”，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去读有不同的收获和体会，常读常新，随着阅历的加深，读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学》、《中庸》是精华中的精华，是人生的必修课。我的体会是，在大学本科阶段，如果一定要比较的话，泛读比精读更重要，在大学里需要开阔的眼界，宽广的胸怀，只有与时俱进，你才能接受新的东西。宽和深是相互促进的，本科是一个基础教育、通识教育，大学读书读的就是思想与方法。

在长期从事考古的叶老师看来，贵州的考古，还有着很长的路要走。对于贵州未来的发展，叶老师也有着自己独特的感悟。

记者：您能谈谈最近遵义播州土司海龙囤遗址发掘对贵州历史研究的影响与意义，以及对贵州考古事业发展的意义吗？

叶老师：自古以来海龙囤是政治军事为一体的地方，是军事要塞、政治中心。当前海龙囤的考古发掘工作对贵州最大的影响便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当前任务就是要把它的全貌揭示出来，它的历史线索、政治文化的全面揭示。贵州的考古就既有的来说，发掘的深度、广度和科学性存在欠缺，系统性和完整性是不够的，整个政府对考古事业的重视还不够。考古应该是一个长期的积累和坚持，而不该是一阵风。现在贵州在大建设中，要实现“后发赶超”，不仅要有工业生产的硬件经济建设，还要有文化的底蕴。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在整个的大框架下还没有形成一个体系。所以贵州现在对考古这一块不是特别重视，还有民族文化的开发、建设、保护都没有做得很好。

记者：您长期从事贵州地方史的研究，您可以谈谈自己对贵州历史的认识与感悟吗？

叶老师：问题太多，很多问题没有解决。夜郎，没有充分的东西证明就是在贵州，夜郎古国的确切位置与社会形态都不知道。“夜郎自大”并不是一个贬义词。汉语工具书都把它释为对妄自尊大者的讽喻，很多人正是通过这个成语知道古代西南曾经有一个夜郎国。但这成语其实是一段误读的历史。夜郎故事首见于司马迁的《史记》。汉武帝开发西南夷后，为寻找通往身毒（今印度）的通道，于公元前 122 年派遣使者到达今云南的滇国，再无法西进。逗留期间，滇王问汉使：“汉孰与我大？”后来汉使返长安时经过夜郎，夜郎国君也提出了同样问题。这段很平常的故事后来便演变成家喻户晓的成语。夜郎自大这个成语到清代已广为流行。话的本意是一句很平常的话，对于历

史不能以讹传讹。

记者：离我们学校最近的贵安新区建设，也是您的主要田野调查点之一，您可不可谈谈您所知道的贵安新区的历史变迁以及建成之后将对贵州省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呢？

叶老师：贵安新区是黔中腹地，自古以来经历了几个阶段的统治时期。它发展的最大特点就是它是多种文化长期碰撞交汇的地方；自古以来是中央王朝治理西南的重要通道，是军事通道、文化通道、经济通道。现在也是很重要的通道，是贵州重要的经济区，它没有重要的矿产，但它是整个西南重要的枢纽站。历史上是重要的通道，现在这个特点更加显现出来。并且贵安新区地势平坦、水利资源充沛、地理位置优越，它具有今日的发展态势是有历史原因的，并且肯定会成为一个经济龙头。天时、地利加人和才造就今天的贵安新区。

在交谈中我们感受到，叶老师有着深厚的历史情怀，正是凭着这“一腔热忱”，才可以把事情做得很好，只有内心真正的喜欢，才能做到他这样的“情满青山，气满肠”。

记者：我校历史专业应该如何发展呢？

叶老师：专业历史已有三十多年了，它最大的特色是研究调查地方史和民族史，把贵州的地方乃至西南的历史文化问题作为我们调查研究的重点。我认为在专业的培养模式上，本科生的培养应该以实践教学为主，真正培养了解贵州、认识贵州，能够去理解历史，能够扎根贵州的本土人才。这样的人才才能“接地气”，与底层的文化打交道。而在其他方面应该扩大办学层次，比如关于硕士点与博士点的申报。历史是很重要的，一个国家没有历史是不可能的，历史是长期性的奠基。

记者：历史带给您最大的东西是什么？我们该相信谁给我们的历史？

叶老师：历史带给我最大的就是享受。历史对于国家有资政的作用，对于一个民族有文化传承的作用。对政治是一种参照，“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对个人来说就是人生的一种享受，它是多层面的。

你从书本上接受的知识理论与信息，它是别人给你的，你必须要去寻它的根，找它背后的东西。看它的角度，你怎么判断它的视角，这就是一种理论分析，你必须站在这种高度去看它。历史不是看一看背一背就行了的，历史要为政治与现实服务，不要否定它的资政作用，所有学科的存在都有一定的资政作用。是你在揭露事实、批判现实、指导前进方向上去服务，不是去为它颂赞歌、做传声筒。历史的文学、哲学为政治服务不是简单的去跟风，简单的去为它做注脚，而是在深度的批判上提出发展的可能性和借鉴性，这个就是它的价值。在信史实录的基础上去分析历史，打通历史与现实，在历史中找到现实发展的智慧和经验。不能简单庸俗化地理解为为政治服务。学历史要“走进去”，更要“走出来”。走进去就是要知道曾经发生了什么，走出来不是说站在几千年前看现在，那样就成为了“古董”，走出来就是说把它的启示和理论带到现实，为我所用，能调节滋润我的心灵、提升我的品格、充实我的人生、扩大我的视野。走进去是知道这个事实，出来时应该带着感悟与收获出来，并运用到现实中去。

我们学历史的应怀抱着“一腔热忱，冷眼看世界”的态度去学。你的热忱就是你的责任、时代的担当，而冷眼看世界就是你要冷静、理性地批判，具备批判的眼光。我希望能够做到“情满青山，气满肠”，因为它是一种理想、一种追求。

时间过得好快，原本定一个小时的采访竟然不知不觉就超过了两个小时，依依不舍地从叶老师办公室出来，我感觉步履轻盈，似乎浑身充满了力量，叶老师的奉献精神、他对专业的挚爱、对事业的执着、对学生的关怀，无一不令我感动，心里不禁在暗暗决定：我也要做个像叶老师那样的人！



叶成勇个人简历

叶成勇,男,1977年10月生,贵州思南塘头人,历史学博士(考古学专业),贵州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1997年9月入贵州民族大学历史系学习,2001年7月获历史学学士学位。2002年入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学习,2005年7月获历史学硕士学位,学位论文为《金沙江中游石构墓葬研究》。2006年9月再次进入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学习,2009年7月获历史学博士学位,学位论文为《黔西滇东地区战国秦汉时期考古遗存研究》。2010年起,被贵州民族大学遴选为中国少数民族史专业硕士生导师。在北京读书期间,至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历史系、中文系选修十门基础课程,并参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在陕西周原为期半年的田野考古实践。

2005年7月,进入贵州民族大学,主要从事历史学和民族学专业的教学科研工作,以下分三个方面加以介绍。

一、教学工作

(一)课堂课程教学

自2005年7月以来,承担了2003级至2013级历史学、民族学和民族语言文学专业的18各班级,共700余人的课程教学任务,开设的主要课程有《中国考古学通论》、《史学导论》、《中国历史文选》、《博物馆学概论》、《史记选读》、《贵州简史》、《田野调查方法》等。同时承担全校公共素质课《文物鉴赏》。

(二)实践教学工作

自2007年始,每年利用寒暑假和节假日,带领历史学、民族学专业学生深入贵州省各地开展实地调查。自2009年9月起,担任历史学教研室主任,系统探索历史学专业本科实践教学方法,在专业人才培养和服务地方文化建设方面都产生了较好的

影响。

1. 2007年7月,带领2005级民族学10位本科生至天柱县石洞镇13各村开展为期7天的侗族历史文化调查。
2. 2008年7月,带领2005级历史学46位本科生开展为期10天的毕业实习,先在贵州省图书馆抄录整理明清时期贵州地方史志,后对花溪高坡苗族历史文化进行实地调查。
3. 2009年1月,带领2007级民族学6位本科生至岑巩县大有乡进行为期6天的文化遗产调查。
4. 2010年“五一”长假期间,带领2008、2009级历史学、民族学5位本科生至遵义海龙屯、正安谢坝乡调查。



5. 2010年7月,带领2007级历史学32位本科生开展为期10天的毕业实习,先至省图书馆抄录整理贵州地方史志,然后至高坡作实地调查。

6. 2011年5月,申报校级教改课题《历史学实践教学探索》,获准立项。

贵州省考古勾画出“文化地图”

中国文化报(李屹):山峦起伏、河流纵横的贵州高原,曾长期被古人视为文明落后的蛮荒之地。而多年来尤其是近年来贵州考古一系列的新发现,却展示了一幅迥异于以上蛮荒印象的壮美的“文化地图”——早在先秦时期,贵州高原就是众多古代族群活动的舞台,以贵阳为中心,来自多个文化圈的不同远古文化争艳贵州高原,在这片土地上汇集、碰撞、交流、融合,使贵州文化具有了显著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丰富多彩很早就成为贵州文化独特的品格。

近年来,出于建立贵州各区域先秦时期文化序列和贵州古代文化谱系的目的,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一方面重点在黔西北的威宁中水盆地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一方面对黔东北的乌江干流,黔东的清水江干流,黔西南的北盘江、红水河干流进行了区域考古调查和试掘,取得了不少重要的收获。对这些考古收获加以宏观扫描后,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王红光博士指出,围绕着纵横的河流和山峦,贵州文化形成了不同的自然和人文区域:黔东北的乌江中下游地区,其自然条件和文化传统与渝东地区相近,属于巴蜀文化区的南部边缘地带;黔东北一直通往湘西的沅江上游,其自然条件和文化传统与湘西相似,东周时期属于百越文化和楚文化的西部边缘地带;黔东南的都柳江流域和黔西南的南北盘江流域与广西的西江水系同为一体,其文化既与云南曲靖地区的古代文化属于同一区域,又与下游红水河乃至于西江的古代文化密切相关;黔西北一隅属于滇东高原的延伸。以贵阳为中心,形成了几个文化圈的接触和碰撞地带,这些不同文化的碰撞带给贵州文化多种多样的基因,奠定了贵州文化开放的、丰富多彩的基调。

在一系列考古新发现中,获评2005中国考古十大新发现的威宁中水遗址群发掘基本建立了黔西北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的文化序列,这一文化系列展现出尤为明显的多种文化交流融合的特点。公元前1300年至前700年,威宁中水所在的黔西北至滇东北的昭鲁坝子曾经有一支以稻作农业和固定山顶祭祀复杂宗教生活为特征的独特青铜文化——鸡公山文化,公元前800年前后,鸡公山文化受到来自四川盆地青铜文化的强烈影响,从而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红营盘类遗存。公元前300年前后,这一地区受到了多种文化的影响,通过云南曲靖地区而来的石寨山文化影响尤为强烈,导致了文化面貌上的巨大变革。

近年来,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北盘江流域发现了14处极具地方文化因素的旧石器时代晚期至魏晋时期的文化遗址,为认识这一时期该地区的文化面貌和社会历史提供了新的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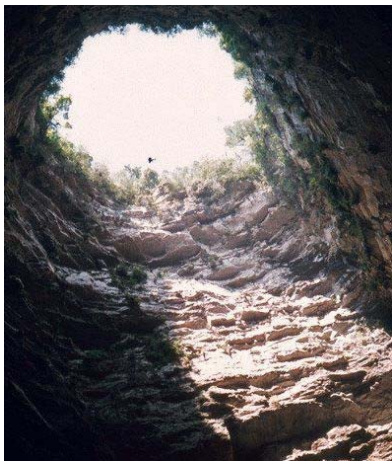
料。

在基本建立了黔西北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的文化序列后,贵州省考古工作将力争在黔北、黔东北、黔东、黔东南、黔西南地区逐步建立先秦时期文化序列,使远古文化在贵州高原汇集交流的“文化地图”更加明晰。专家称,这对重新认识贵州乃至我国西南地区的历史有重要意义。

资料来源:贵州省考古勾画出“文化地图”.华夏经纬网.(2007-09-02)[2014-06-17]<http://www.huaxia.com/wh/kgfx/2007/00579275.html>

贵州民族考古资源丰富成果斐然

记者在11月29日结束的“边疆民族考古与民族考古学论坛·2009”上获悉,我省是中国边疆民族考古资源最丰富的地区



之一,开展民族考古工作的历史源远流长,成果斐然。

论坛由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边疆考古研究中心、中山大学、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举办。贵州、海南、河南、深圳等地和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人民大学等机构的50多位专家学者,就各地

7. 2011年7月,带领2008级历史学38位本科生开展为期12天的毕业实习。先抄录整理《清史稿》有关贵州资料,后至安顺市大西桥镇鲍屯和九溪进行历史文化实地调查。

8. 2012年7月,带领2009级(1)、(2)班分别开展为期14天的毕业实习。先两个班集中在贵州民族大学图书馆抄录整理贵州地方史志,然后与地方政府合作,分别至长顺、关岭两县作7天实地调查。

9. 2012年12月,教改项目《历史学实践教学探索》结题,获校级优秀档次。

10. 2013年1月,带领2010级历史学6位本科生至从江县洛香和黎平肇兴作为期7天的侗族历史文化调查。

11. 2013年指导本科毕业论文15篇。

12. 2013年7月,带领2010级37位本科生和1位中国少数民族史硕士生开展为期14天的毕业实习。先在贵州民族大学图书馆校勘整理前几届学生的抄录地方史志资料,然后赴贵安新区湖潮和党武两个乡进行抢救性历史文化实地调查。

二、科研工作

(一)主持和参与课题

1. 2009年12月,主持贵州省教育厅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项目《贵州西部战国秦汉时期土著遗存综合研究》(编号:黔财教[2009]167,已经结题)。

2. 2010年7月,主持国家社科基金立项《黔西滇东战国秦汉时期考古遗存综合研究》(编号:10XKG002)。

3. 2010年12月,参与由郭国庆副教授主持的贵州省省长基金课题《贵州古旧家谱调查研究》。

4. 2012年10月,主持贵州省教育厅基地项目。

的民族考古研究成果进行了展示和交流,对古代边疆考古发现与研究、民族考古学研究及理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调查与研究等主题进行了探讨。与会代表参观了高坡洞葬和镇山布依生态博物馆。

论坛认为,贵州民族成分之多,排列全国第三,是中国边疆民族考古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目前全省境内发现史前洞穴遗址300余处,数量居全国前列。新时代时期至商周时期,我省境内古文化遗址存在着明显的小区域文化特色,反映了不同族系的活动情况。战国秦汉时期,云贵高原被称为“南夷”之地,今贵州西部至云东南部一代系古夜郎国活动地,这一时期我省考古工作者在当地发掘的可乐墓地、威宁中水银子坛墓地、普安铜鼓山等遗址,体现了异常丰厚的地方民族文化特色。赫章可乐墓地出土的“套头葬”葬俗至今为国内仅存;鸡公山遗址发现数量众多的祭祀坑,在西南地区史前文化遗存中尚属首次,为中国西南地区史前山地民族原始祭祀活动的研究提供了重要材料,这两处考古发现均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据悉,贵州境内的考古遗存被视为民族考古学研讨的重要对象,特别是许多民族至今所保留的技术传统、生计方式、聚落格局、宗教信仰都对理解和阐释有关考古发现提供了有益参照。近年来,我省考古部门为抢救、保护民族文化遗产,对黔南地区的水族古墓群进行全面调查和重点解剖,获取了大量第一手材料,成为引领贵州考古前进,与旧石器时代为核心的史前考古和以“夜郎文化”为核心的战国秦汉考古并驾齐驱的“三驾马车”之一。

资料来源:贵州民族考古资源丰富成果斐然
金黔在线.(2009-12-02)[2014-06-20]<http://gzrb.gog.com.cn/system/2009/12/02/010691035.shtml>

